

陈毅和他的师弟裴先章

民国初年,成都老东门外锦官驿有一家著名的私塾,老师裴野堂闻名乡里,陈毅就在那个私塾启蒙读书。那时,陈毅还不叫陈毅,而叫陈士俊。陈士俊与裴老师的爱子裴治同坐一桌读书。陈士俊年龄稍长,他们以师哥师弟相称,师兄弟俩朝夕相处,情同手足。当时,他们不可能想到,后来他们会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路;他们更不会想到,这两条路走着走着,又会合了……

陈毅原先不叫陈毅

陈毅的父亲觉得儿子陈士俊这个名字不十分好,不能表达对儿子的期望,请裴老师给陈士俊另外取一个名字。裴老师平时也很器重这个学生,认为陈士俊无论天分气质都为诸生所不及,是该给他另外取个较好的名字。裴老师郑重其事地思考了几天,最后选定《论语》中的“士不可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语。根据《四书集注》:“弘,宽广也。毅,强忍也。非弘不能任其重,非毅无以致其远。”便给陈士俊改名陈毅,字仲弘。

裴治和陈毅长大成人后,陈毅当了共产党的将军,统领百万雄师过大江;裴治当了国民党的将军,屡战屡败,困守天津城。

1948年的阳春三月,平津战役已近尾声,裴治当时任国民党防守天津城的第八十六军少将参谋长,解放军的“隆隆”炮声,已使裴治感

到败局已定。

裴治半生戎马,历经沧桑,早已预料到国民党的大势已去,只有去投奔他的师哥陈毅才是惟一出路。但是战事愈吃紧,监视将领的“特”字号人物越是寸步不离。正当裴治进退两难之际,他手下的一个下级军官送给他一封信。裴治拆开一看,原来是中共天津市委城市工作组写给他的。内容是敦促他弃暗投明,不要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,何去何从,应当机立断,无须犹豫。

裴治从信上的语气揣摩,字里行间或多或少透出几许故旧的殷切希望。裴治在解放军中的故旧只有两人,一位当然是他师哥陈毅,另一位是与他打过交道的陈士渠。接到信的那天晚上,裴治躺在床上辗转反侧,夜不能寐,经过反复思想斗争,做出最后的抉择:脱离反动派,走向人民阵营。

在炮声“隆隆”、枪林弹雨中,裴治把生死置之度外,跨过无数战壕,爬过无数炮痕累累的土地。在半路上他偶然拾得一支普普通通的钢笔,笔杆刻有“先章”二字,这对他有较大的启发。先章、先章,谱写先进之章,于是他便为自己改名裴先章,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他高龄去世。

裴先章初遇陈士渠

1946年的暮春时节,一架军用飞机从重庆飞往北平。飞机上坐的全是去参加北平军调处谈判的国共两方代表和美国代表。在飞机上,裴治初遇中共代表陈士渠。陈士渠当时是陈毅的参谋长。

裴治出身于黄埔军校

十期,毕业于陆军大学十九期,当时任国民党军政部上校整编科科长。举凡有关国共双方会谈整军问题,无论在重庆或在北平,他都是参加者之一,因此与中共代表有接触的机会。

军队的整编是个大问题,双方争论也非常激烈。裴治与陈士渠在谈判桌上互不相让,势同水火。尽管如此,裴治也感到自己所言于理有亏,对陈士渠议论纵横,言而有据,心中暗暗佩服。

有一次,国共双方在北平协和医院会谈,裴治看见陈士渠去洗手间,他想探听他师哥陈毅的消息,也悄悄地跟了进去。靠近陈士渠,他故意打官腔:“你看,现在在全国不聊生,生灵涂炭,你们还闹什么革命,干一些杀人放火的事,我劝你们以大局为重,把部队交出来算了。”陈士渠冷静地听裴治把话说完,一点也不生气,不像在谈判桌上那样义正词严地反驳,只是微微一笑,他说:“有人说我们共产党人红眉毛、绿眼睛,你看我的眉毛红不红,眼睛绿不绿?你在哪里看见我们杀过人,放过火?”陈士渠说到这里把话题一转,亲切地问裴治:“你父亲是陈毅的老师吧?我们的陈毅同志可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儒将,日本人听到他的名字也惧怕三分。我问你:你父亲教出来的学生会杀人放火吗?”裴治自知失言,连忙向陈士渠道歉。陈士渠拍拍裴治的肩头:“老裴,百闻不如一见,你到我们解放区去看吧。”裴治握着陈士渠的手说:“老大哥,我一定去,我一定要去,我拜

托你转告我师哥,我一定要去解放区找他。”

裴先章商丘会见陈毅

裴治改名裴先章从平津前线跑了出来,以后就用“裴先章”这个名字化装成商人,脱离虎口,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,闯过无数关口,终于进入了刚刚解放的济南。打听到解放军前沿指挥所的对接待室,立即跑去要求见面见陈毅。

裴先章后来在四川省黄埔同学会内部刊物上回忆当时的情形:在接待室接待我的是粟裕将军。在谈话中粟裕将军好像对我的情况十分清楚,他告诉我陈毅不在济南,他替我联系,把我安排在一个旅馆内,听他的消息。我在旅馆内等待了三天,粟裕将军告诉我陈毅在河南商丘,他派了一辆军用吉普送我去商丘见陈毅。

1949年2月4日,我到了商丘城一探听,才知道陈毅没有住在城内而是住在离商丘还有20华里的一个村子内。20华里并不远,我想走路去,解放军两位高级军官告诉我:车子已经安排好了,他们要陪我去。这两位高级军官,一位是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处长杨国宇同志,一位是张若千同志。

我们到了那个村子,师哥听说我来了,从一间又矮又小的茅草房子里走了出来,我们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拥抱在一起。

师哥的神态一点也没有变,音容笑貌还是少年时候的师哥。令我十分惊讶的是:师哥是个统领千军万马、名震大江南北的解放军司令员,竟住

在一个简陋的茅草房内,穿着像个贫苦的农民。

陈毅派裴先章策反

在商丘,陈毅告诉裴先章,淮海战役已经胜利结束,下一步我们将要百万雄师下江南,目标是解放东南最大的两座城市南京和上海。

陈毅问裴先章:“你跑来找我,你的身份暴露没有,有什么人知道?”裴先章说:“绝对秘密,没有任何人知道。”陈毅说:“那就太好了,为了缩短时间,减少双方的伤亡,你愿不愿意先过江去做我们的内应?”裴先章说:“这正是我向往立功赎罪的大好机会,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,我向你立下军令状。”陈毅说:“那你就去吧,我相信你,你去南京在高层人物中策反,一定要注意安全。”

陈毅给裴先章配备了一部电台、两个助手,发给他两大口袋钞票、几十两黄金,并设宴为他饯行。

1949年4月21日,裴先章与随行人员抵达安徽蚌埠,会见了军管会主任曹荻秋,决定由解放军第三十三军军长窠子健护送他们一行继续前进。到了张八岭,过了警戒线,窠子健与裴先章告别,裴先章又以原来的名字裴治进入了兵荒马乱的南京城。

在南京城他遇见了两个不想见的人,一个是他的顶头上司陈诚,另一个是他“陆大”的同学、陈诚的参谋长郭寄岭。郭寄岭奉陈诚之命,给裴治送去一张委任状,委任他到台湾去任警备司令部中将高参。裴治并没有拒绝,只是答应在南京把事情

办完,回四川安顿一下他的妻室儿女,就去台北报到。裴治之所以这样做,并不是真想去台湾,只不过是正好以它做掩护。

裴治不负陈毅的重托,由于裴治策反成功,江宁要塞起义投诚,虽有大炮,但一炮不发。4月23日,解放军渡江的小木船和小火轮在南京的江面上来回平安摆渡,风平浪静安然渡江,使国民党22年经营的南京回到人民的手中。

在上海解放后,陈毅任上海市市长,陈毅对裴先章说:“师弟,你为人民立了大功,就留在上海助我一臂之力吧。”后来考虑到二野很快就要进军西南,裴先章又接受任务回西南。陈毅设宴为他饯行。裴先章回到四川后,又策反了几个蒋军嫡系部队,为成都的和平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时过境迁往事不依稀

上世纪50年代,陈毅把恩师父子裴野堂和裴先章请去上海做客,再一次挽留裴先章在上海工作,因为裴野堂年迈需要照顾,裴先章才没有留在上海,回到成都,被安排在川西行署办公厅工作。

1992年3月,正当春暖花开的时节,已是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渠上将偕夫人李铮同志,专程从北京来成都看望裴先章,住人民西路成都军区新华宾馆。他来不及洗尘休息,就拜托前来看望他的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同志,约阔别40余年的老朋友裴先章在成都军区见面。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重逢,相互拥抱,热泪盈眶。李英摘自《文史春秋》

超越血缘的父爱治愈女儿的心脏病

15年前,邱楚良给捡来的女儿取名叫邱德梅,是希望女儿长大后能集美德和美貌于一身。如今,邱德梅15岁了,可她的身高只有1.2米,体重也不足30公斤,看上去完全像个八九岁的小孩。医生说,邱德梅的身体之所以发育缓慢,原因是她患有一种很罕见的叫“紫绀性”的心脏病,造成心室间隔缺损,肺部静脉血管异位,严重影响了孩子的正常发育速度,如果不能及时做手术,邱德梅有可能只能活到19岁……



邱楚良在照顾手术后的女儿

是泪水……

赶集路上捡回一个弃婴

在四川隆昌县迎祥镇华盛村,邱楚良一家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户,他有一个哥哥和4个弟弟,家中生活全靠种田维持。在兄弟中,邱楚良身体最弱,个子最小,村里人常叫他“武二郎”。

20多岁时,眼看着村里的很多同龄人结婚生子,邱楚良也暗暗着急。可父母托了很多媒人为他说亲,女方一上门,见他又小又矮,家徒四壁,二话不说转身就走,邱楚良到了二十七岁还没娶上媳妇。

1993年农历三月初五,迎祥镇赶集,邱楚良早上天不亮就挑着几十斤蔬菜出门去了。来到镇上,邱楚良正寻思把菜摊摆放在什么地方,突然听见从路边的草丛中传来几声婴儿微弱的啼哭声。邱楚良放下蔬菜,急忙奔过去,看见草丛中有个半旧的襁褓包裹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婴儿,婴儿正闭着双眼啼哭着,脸蛋上全

尝尽了生活的艰辛。

1994年夏天,女儿1岁多时,一个女人闯入了邱楚良的生活。这个女人叫黎太莲,家住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。

这年8月,黎太莲经人介绍与邱楚良相识,听人说邱楚良对养女照顾得无微不至,不由被这个男人的爱心所打动。黎太莲是家中的独女,她向邱楚良提出的唯一要求是,将来结婚后要去凉山州生活。

家的温暖暂时驱散病魔阴霾

1995年初,邱楚良与黎太莲正式结婚,一家人迁居到凉山。小德梅不仅有疼爱她的爸爸,也有了疼爱她的妈妈,成天像一只快乐的小鸟,可心脏病的阴影仍然时刻笼罩着这个孩子。1999年,邱楚良决定带女儿到成都做检查。这一次,专家得出的结论是,孩子所患的是在医学上被称为“紫绀性”的先天性心脏病,建议立即为孩子做手术。

邱楚良也很不能马上让女儿做手术,可听说手术费用需要五六万元,他只好抱着女儿悄悄离开了华西医院。

这年秋天,黎太莲顺利生下一个男孩,家中的处境更加艰难。邱楚良开始背着妻子去镇上的血站献血,换取几百元营养费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。

2000年6月,因为女儿邱德梅接连2次重病住院,家里连为儿子买奶粉的钱也拿不出来了,已经去血站献了2次血的邱楚良,竟第3次去献血。孰料,献血之后,邱楚良怀揣着300元钱营养费回家,他在路上竟被两个歹徒抢劫了。这天晚上,邱楚良浑身是伤地回到家,黎太莲大吃一惊:“楚良,是谁把你打成了这

样?”邱楚良无法再隐瞒下去,他只得对妻子说出了自己去血站献血的事。这一夜,夫妇俩谁都没合眼。“楚良,我们回隆昌去吧,再说也应该送梅梅上小学了。”半夜时,妻子说出这样的想法。邱楚良听从了妻子的意见,夫妇俩带着一双儿女回到隆昌。

2000年秋天,邱德梅上小学1年级了。然而,邱德梅成绩一直不好,连续3年降级。邱楚良不明白,女儿平常爱说爱笑、聪明伶俐,为什么在学习上表现得如此糟糕呢?他多次去学校询问老师,老师们说出了原因:“梅梅虽然在智力上没问题,可身体很虚弱,每次上课都支撑不下去,常常精神恍惚,老师讲的内容也记不住,根本没有正常孩子那样的学习效率。”

2006年年末,一天傍晚,邱楚良正给庄稼打农药,有人突然跑来对她说:“邱楚良,快去看看你的女儿吧。她在路上晕倒了!”邱楚良吓了一跳,扔下农药箱就向村小学跑去。在半路上,他果然看见女儿紧闭双眼躺在地上。邱德梅被父亲送进了镇上医院,接着又被转到内江。

邱德梅住院20多天,2007年1月12日出院时,医生将邱楚良叫到办公室说道:“你女儿的病情现在只是暂时稳定,只有做了手术才会彻底好起来。”此时,交纳了2000多元治疗费,邱楚良身上剩下的钱不足100元,他就是回家砸锅卖铁也凑不起为女儿做手术的费用啊。邱楚良作出了一个人一生中艰难的决定:将真实身世告诉女儿。

“楚良,你要想清楚,梅梅一直认为我们就是她的亲生

父母,她能接受自己是被捡来的这个现实吗?”回到家,听了丈夫的决定,黎太莲顾虑重重。“梅梅的病情越来越重,如果哪天要有个三长两短,她连自己的真实身世也不知道,这不公平。”邱楚良执意在这天晚上对女儿说了她的身世秘密。

女儿的梦想是当医生

2007年5月,女儿的病情不断加重,邱楚良不能让女儿成天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啊。邱楚良只好找到哥哥和4个弟弟商量,凑了2000元钱,于7月12日再一次送女儿到了华西医院。手术费用已上涨到8万元,邱楚良身上所带的钱只是杯水车薪。

晚上,邱楚良和女儿住进了老乡们在一个工地上打工的工棚。他对女儿的这份浓烈的父爱打动了工地上的每一个人,工地老板毅然同意让身材矮小的邱楚良留在工地上做小工,每天的工资是40元钱,还解决了他和女儿的吃住问题。

从这天开始,邱楚良每天干活时就让女儿呆在工棚里学习,自己则在工地上挑沙抬砖。邱楚良过去患有肾炎,医生曾叮嘱他不能干重体力劳动,可他这时候只是一心想要挣钱为女儿做手术,早把医生的叮嘱忘得干干净净。

有人告诉邱楚良,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是全市第一家惠民医院,做手术的费用也许会低一些。8月21日,邱楚良带女儿来到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。可询问的结果,尽管手术费只需要5万多元,但仍然让邱楚良不堪承受,他不得不垂头丧气地带女儿离开医院。

刚走出医院大门,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从身后追上来,叫住邱楚良问道:“叔叔,你刚才对医生讲你的女儿已经15岁了,我也是15岁,她是得了什么病不能长高啊?”

女孩名叫王伊,就读于成都外国语学校初三(1)班,刚刚参加完了中考。在这座陌生的城市,邱楚良从没想到会被陌生人如此关心,他把女儿的遭遇告诉了王伊。

很快,王伊打电话把邱德梅的遭遇告诉了她的同学。这群中学生于是受王伊的感召,纷纷响应,不但捐出了他们的零花钱,还与成都市红十字会取得联系,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,他们走上街头连续7天顶着盛夏的酷日为邱德梅募捐。8月29日,王伊和同学们把募集到的1.2万元送到邱楚良打工的工地上。

9月9日,邱德梅住进了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。院方在了解到邱家的处境和邱德梅的身世后,在手术和治疗费用上给予了最大优惠,全部费用减少到1.5万元,医院党委书记李雅萍也向邱德梅捐出了2000元钱。10月11日,邱楚良的六弟邱楚发用住房做抵押,贷款3000元筹集为邱德梅做手术的全部费用。手术于10月13日上午顺利进行,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文自力亲自主刀,时间持续了近4个小时。

手术后,看见女儿过去乌黑的嘴唇很快有了血色,邱楚良高兴极了。邱楚良说:“梅梅说,她将来要做一名医生,去救助更多像她一样贫穷而看不起病的孩子!”

(谢绝转载,上网)

张陶 杨嘉利/文·图